

《圣经》说的都是真事儿

朴朴

在将这条公路拓宽之时,一台压路机突然间掀开了一个洞穴的洞口。人们吃惊的是从来没人知道公路下面竟然另有洞天。修路工作被紧急叫停了,几个小时之内,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就紧急抵达了这里,开始对这个神秘的洞穴进行研究。这种情形在以色列屡见不鲜。在这个国家,文明至少可以回溯到五千年以前,每一寸土地下面都可能掩埋着惊世的考古发现。自有史以来,几乎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帝国都曾占领过这片土地,或曾为它征战,或至少经过过这里——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十字军……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建筑、坟墓和文物。1995年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有大约300起考古发掘。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抓住机会,在1995年,通过历时17个月的艺术、音乐庆典和考古展览会来庆祝古代以色列人征服耶路撒冷3000周年。这次庆典1995年九月开幕,不仅展示了以色列的古老历史,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一行为也提升了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的怨恨,他们坚称耶路撒冷属于巴勒斯坦,害怕以色列人见什么挖什么的考古热情会威胁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国乃至邻近地区的伊斯兰圣迹。不过以色列之所以举办这一庆典,就是为了让人们铭记这一地区所见证的一段特殊的历史。这里是30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圣地。根据《圣经》和《可兰经》,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相传为希伯来人的始祖·《圣经·创世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曾踏足这片土地。他们以

及圣经中记载的其他人物的生平究竟怎样?甚至于他们是否真实地存在过?答案就在考古学家掘出的每一铲泥土里。

随着光明节和圣诞节的临近,庆典上展出的形形色色的文物,更让全世界的信众感觉到最近一个世纪、



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这些考古发现为他们信奉的传说建立了事实依据。如今学术界如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圣经》中的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物、地点和事件,比如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杀死巨人哥利亚的大卫王;先知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大迁徙;约书亚征服应许之地和耶利米的悲观预言等。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在不断寻找能够解决一些未解之谜的新证据。摩西是否真的存在过?《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大迁徙真的发生过吗?约书亚是否真的进行过耶利哥之战?耶稣是否真的驱赶过兑换钱币

的商人?《圣经》何以诞生,又是何时诞生的?

再回到那个高速公路旁那个刚刚重见天日的洞穴。这个位于耶路撒冷西北25英里的洞穴里,有23个盛放着骨骸的棺材。经过一次匆匆忙忙的分析,有人发现一个石箱上的若干字母拼出了“哈斯摩”这个名字的一部分,哈斯摩家族也称“马加比家族”(公元前一世纪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祭司家族),是历史上著名的犹太爱国者家族。传说犹太圣殿时期,圣殿中的七盏橄榄油灯长明不灭,但因希腊侵略者的破坏而中断。马加比家族起义成功后,重新点燃希望油灯,然而他们只找到一罐只够点一天的橄榄油,但这一小罐橄榄油竟奇迹般地燃烧了八天。因此如今每到光明节,犹太人都要在八天的仪式上点燃光明节烛台纪念这一史迹。

这一发现首次为这个传说中的家族的存在提供了事实证据,在此之前,马加比家族的故事只流传于旁经野史之中。然而两个星期后,从以色列的古代史权威那里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地穴中的文字被误解了,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骨骸属于马加比家族。在圣经考古学的科学雷区中,类似的坎坷总是在所难免。考古发掘总是伴随着真真假假,因为研究人员们只能尝试通过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雕塑碎片来重建古代社会。在基督教圣地鉴定来自圣经旧约时代的文物尤其困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任何所罗门王时期或更久远的文字记载留传至今。因为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古代以色列人喜欢用易腐蚀的纸莎草纸写字,而不是像众多

邻国那样写在耐久的陶器上。

圣经考古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在西方社会的几乎每个人都和《圣经》息息相关（《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基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不想听到有人说《圣经》的一部分可能是虚构的；而无神论者迫不及待地想证实一切只是个童话故事。《圣经》的记述是否基于事实，其意义十分重大。

有学者不相信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耶稣复活等神迹，因为它们毕竟是超自然事件。与此相反，学者们却很少有人怀疑“旧约”后半部分以及“新约”大部分人物的真实性，比如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耶利米、耶稣、彼得等——虽然总是有人怀疑他们的部分故事的真实性。然而一系列决定性的发现显示，一些《圣经》中更古老的故事也同样确切地基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在1990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古城阿什克伦出土了一具小型的镀银青铜牛犊雕像，使人不禁联想起“出埃及记”中提到的巨大的黄金牛犊雕像。在1986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已知的最早《圣经》文本，该文本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600年。它说明至少圣经旧约中的部分内容，是在其描述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被写了下来。同样是在1986年，学者们鉴定了一枚属于尼利亚的儿子巴录的印章。巴录是先知耶利米的门徒和书记员，他在公元前587年记录了耶利米的预言。不过《圣经考古学评论》杂志创始编辑赫谢尔·山克斯说：“考古学很少与《圣经》中确切提到的人物面对面。”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一個，当数1993年一支考古队伍在以色列北部但城土丘的一座古墓里出土的公元前九世纪的铭文。文字刻在一块玄武岩上，提到了“大卫的家”和“以色列之王”等字样。人们首次在《圣经》

之外找到了这位犹太君主的名字，这也证明了大卫王不仅仅是一个传说。这些发现和理论重新引起了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一些宗教历史常识的热切争论。例如学界普遍认同圣经中所罗门王之后的犹太史基本忠于历史，因为同时期的埃及人和亚述人的铭文，证实了《圣经》中关于后所罗门王时期的以色列国王和战争的记载基本属实。

但有些专家对于《圣经》中关于公元前930年之前、即所罗门王时期之前的一切记述都持否定态度。学术分歧的一方称为“最高纲领派”，他们认为《圣经》可以当作考古研究的工具书；另一方可以叫做“最低纲领派”或“圣经虚无派”，他们坚信《圣经》只是一部宗教文献，而不能被视为客观资料。先是“最高纲领派”，后是“圣经虚无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直到西方探险家在19世纪中期开始对圣地进行虔诚的探访，其中第一位严肃的研究人员是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东方学家爱德华·罗宾森。罗宾森在1837—1852年间，对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罗宾森经过寻访后鉴定了几百处古迹和旧址。他确定了马察达（死海东岸的山地要塞）的确切位置，还在耶路撒冷找到了一座用以支撑圣殿山的雄伟的拱门。罗宾森的考察随即引发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探险风潮。许多早期的访问者并不客观，他们一心想去证实、而不是检验《圣经》中的历史。到19世纪末期，德国的自由主义圣经批评家们认定，《圣经》本质上只是一部神话。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闪族语系教授威廉·福克斯威尔·奥尔布莱特取得的重大进展，学术天平又偏向了另一边。奥尔布莱特并非简单假设《圣经》是完全真实、或完全虚构的，而是试图通过独立的考古学证据，确认“旧约”中的故事。在他的

影响下，圣经考古学终于成为一项缜密的科学事业。

奥尔布莱特的学术继承者包括以色列考古学家比朗和后来的亚丁，他们的假设与奥尔布莱特相似。晚年的亚丁曾经说过：“‘旧约’是我的指引。对我国人民来说，它就是一部信史。”比如根据《圣经》的记述，所罗门王当年曾经加固过哈措尔、基色和米吉多城。20世纪50年代末，亚丁果然在哈措尔城的遗址上找到了一座城门，亚丁断定它建于公元前10世纪的所罗门王时期。当他得知早期探险者在基色也曾发现过相似的城门时，他也将它划入所罗门王时期。由于《圣经》在同一句中也提到了米吉多城，因而亚丁开始在米吉多城寻找相似的城门，果然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于是亚丁推论这些城门都是由所罗门王建造的。但当代批评家指出亚丁的论证方法并不科学，也极易出错。耶路撒冷的英国考古学校副主任约翰·伍德海德说：“这实际上是种循环论证法。亚丁利用数据来证明经文，又用经文来测定那些城池的年代。”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大卫·乌希什金认为，这三座城的城门根本不属于同一时期。他指出：“哈措尔的城门可能的确建于所罗门王时期，米吉多绝对更晚一些。基色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随着过度信赖《圣经》的现象重新抬头，另一波极端怀疑主义的浪潮也在近几年蔓延开来。在1995年圣经文学协会和美国宗教学院的费城年会上，怀疑主义者的声势十分浩大。当个别学者的观点出现差别时，激进的圣经虚无论者、来自北卡罗莱纳学教堂山校区的约翰·范·希特斯总结了他们这一派的一般立场。希特斯充满自信地断言：《圣经》的最早文本成文于以色列人流放巴比伦时，时间是在公元前587年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先知摩西、过红海，

上帝也没有在西奈山显现过。

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得向证据低头，怀疑论者也是如此。对于考古学来说，没有证据不代表证据不存在。考古发掘类似于撞大运，一次误打误撞的发现就能让怀疑主义的泰山轰然倒塌。1979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加百利·巴凯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古墓内发现了两个小巧的银卷轴，据推算这两个卷轴来自公元前600年，即在所罗门圣殿的摧毁和以色列人被放逐巴比伦前不久。在以色列博物馆内，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卷轴，他们惊奇地发现，刻在卷轴表面的一句祷词竟然来自《圣经》的“民数记”。这项发现清楚地显示，在怀

疑论者认定《圣经》成文的时间之前，《圣经》中的部分经文就已经广为流传了。在1986年，考古学家们披露道，他们在1975年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买来的名为“印玺”的成型陶土块，曾经一度用于签署文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Nahman Avigad鉴定了其中一枚印玺上的印文，认为它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的印章。巴鲁是先知耶利米的门徒和书记员，他记录了耶利米的末日预言。另一颗是约雅敬王之子约雅斤的印。“耶利米记”中说他曾试图逮捕耶利米和巴鲁，但却以失败告终。这两枚印章再次确证了圣经人物的存在。



超自然的都灵裹尸布

文杰

小教堂藏着“耶稣裹尸布”

都灵大教堂建于1498年。教堂不是很大，却因其内保存有基督教在全世界保存得最严密，引起最大争论的一件遗物——“耶稣的裹尸布”，而闻名世界。“耶稣的裹尸布”是一块长4.27米，宽1米的亚麻布。稍微隔开一定距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正面与背面的影像。影像身高1.8米，长发垂肩，双手交叉放置于腹部，在头部、手部、肋部与脚部有清晰的红色血渍状色块，正与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钉死时的状态相同。

宗教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尽管梵蒂冈从来没有宣布过裹尸布是可信的，但它还是被当作基督教的一个特殊物件来收藏和尊敬。尸布每一百年大约只拿出来公开展览四次，每次展览，远近成千上万的教徒都赶来瞻仰。他们相信所看到

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2012年圣诞节临近之时，被认为记录耶稣容貌的都灵裹尸布再度引起关注。意大利政府科学家称，都灵裹尸布上的标记只能通过“某种电磁能量”（例如短波长的闪光）产生，但中世纪的人不可能拥有该技术，因此认为裹尸布并非人为伪造。然而，科学家未能解释标记当时如何得来，暗示它们来自“超自然力量”。

意科学家认为是超自然

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及可持续发展机构科学家经多年研究，成功以极短程、高密度的紫外线激光，制造出相似图案。科学家指，要仿制裹尸布标记的色彩、质感和深度，只能以紫外线激光完成，中世纪明显没有这些技术。科学家同时指出，标记包含很多“物理和化学特征”，不太可能在实验室内人工制造出来。

都灵裹尸布

都灵裹尸布据称是耶稣下葬时包裹耶稣身体的麻布，作为天主教的圣物之一，其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布面上清晰可见的耶稣身体的轮廓，几个世纪以来围绕耶稣裹尸布的真伪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意大利一位专家仔细研究了都灵裹尸布的照片之后认为，现存的都灵裹尸布其实是赝品。“耶稣的裹尸布”最早发现的是法国人。1356年左右尸布首次被公开，顿时引起整个基督世界的震动，因为布上的人影不仅容貌酷似传说中的基督，且还有血迹。后来在宗教学者的研究之下，认定这块布是耶稣死于十字架之后，用来包裹其尸体的，因而留下了耶稣的身影。裹尸布最早出现在中东，几经辗转才最终流至意大利。由于这块布是基督教的圣物，意大利将之视为国宝。